

论 容 闳

——纪念容闳逝世七十周年

丁 宝 兰

容闳，字纯甫，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1828年生于澳门，1912年在美国逝世。容闳一生经历了我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整个历史时期，还卷入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某些反清的武装斗争事件。他在青年时赴美国留学共八年（1847—1855年）^①，回国后又因公出洋赴美三次（1863—1865年；1872—1881年；1883—1894年）；1902年因清政府严令通缉他，他已到了七十四岁高龄，被迫逃到美国避难，在美终老。他的八十四年的一生中，有约三十年在美国度过，很可能使人认为他是美籍华人。诚然，他以美国为第二祖国，他的妻子是美国人，他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情感很深厚。但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1898年美国国务卿舒曼公开宣布：“容闳从未合法地归化为美国公民。”^②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少年起接受西方教育，而他的爱国热忱始终如一。他在回忆录《西学东渐记》自序中说：“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③研究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西学”的启蒙思想家，实事求是地总结和分析他的活动和思想，探寻出一些值得记取的经验和教训，恐怕不是没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罢。

容闳在美国留学，深受美国那种资产阶级教育的熏陶，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观点和信念。他在归国前下定决心，归国后“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④。他

① 有人说容闳是我国留美学生之第一人，实是误会。容闳自己说：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耶鲁大学——引者）的中国留学生”。参阅《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8页。

② 转引自钟叔河：《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

③ 《西学东渐记》，第1页。

④ 《西学东渐记》，第23页。

说：“在美读十三州独立史、南北战争史，颇有归国建造中华之想。”^①他想建造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他抱着这种政治观点和理想回到祖国时，一下子碰到的是一个极端顽固的、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环境，同时，这个国家的社会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当时太平天国已占领南京，建成天京。在1856年8月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火并的大变乱以前，革命形势较好，全国许多地方的劳动人民纷纷起义响应。容闳于1855年归国后住在广州时，广州爆发了一场劳动人民的暴动。两广总督叶名琛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加以镇压，在是年夏季几个月内就屠杀了七万五千多人。容闳亲往刑场察看，目睹这一惨象，义愤填膺。他还作过一些调查：“人或告余，是被杀者有与暴动毫无关系，徒以一般虎狼胥役，敲诈不遂，遂任意诬陷置之死地”，以致被杀者“强半皆无辜冤死”^②。他还指出叶名琛的兽行实是发泄他对太平军的阶级仇恨。他“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③。容闳反封建暴政的立场是鲜明的。

当然，容闳虽然同情太平天国，但对她还不了解。所以，后来到1860年碰到适当机会，他就毅然亲到天京访问。当时一般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中上层人士，无不视太平天国为洪水猛兽，容闳访问天京这行动本身就极为难能可贵。

这时，洪仁玕已到达天京，封为干王，在天王领导下总理朝纲。容闳于1856年在香港和他结识，曾相约在南京再见面。这次适逢其会，得如所愿。他到天京访问的主要目标正是谒见洪仁玕，想通过访问了解“太平军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④洪仁玕邀请他参加太平天国事业时，他虽然婉辞，但从他向干王条陈七点建议的事来看，他对太平天国不仅仅抱有同情，而且确希望对她有所贡献，有所效力。那七点建议是：

-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
- 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之军官；
- 三、建设海军学校；
- 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
- 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 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苏教圣经列为主课；
- 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⑤

他认为，这些建议是针对由上海至南京沿途考察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是带根本性的政策。他还明白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

① 刘禺生：《纪先师容纯父先生》，见《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1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30页。

③ 《西学东渐记》，第31页。

④ 《西学东渐记》，第50页。

⑤ 《西学东渐记》，第56—57页。

卒。”^①洪仁玕只在原则上赞赏他的建议，在实际上并没有采纳付之实现。据干王说，天朝对于重大的兴革，都必俟文武领导人协议，经多数赞成，才能实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天国军事形势不大好，前线吃紧，不得不以武装斗争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暂时未能着眼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长远计划。洪仁玕虽然未能实行容闳的建议，但对他来访天京的义举非常赞许，特授他以“义”字封爵（太平天国的四等爵）。这说明太平天国对容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恳切的期望。可惜的是，容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实未敢信其必成”^②，于是婉转推辞封爵，离开天京返回上海。

后来容闳在回忆录里用了专章来对太平天国进行深刻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之所谓革命，只有战国时期的变革算是真正的革命，以后在封建时代二十多次的“革命”大抵是“一姓之兴废”，即封建制度下的改朝换代，“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而“太平军战争之起，则视中国前此鼎革有特异之点”^③。这里他卓越地看到太平天国的反封建革命性质及其与过去改朝换代的根本区别。虽然他对于革命根源于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冲突、对于革命的阶级分析、对于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局限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弄懂，但他经过实地的考察，终于能获得若干合乎历史实际的想法。

他也力图探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认为洪秀全宣传拜上帝会的宗教活动受到压迫“不过是爆发之导火线”，“恶根实种于满州政府之政治，最大的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④。这部分地揭发了封建统治的腐朽性质，有其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他还进一步地看出太平天国革命不是偶然发生、不是仅仅出现了洪秀全这个英雄人物才导致的，而是有其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他说：“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能免于革命。”^⑤这个深刻的论点证明容闳确比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高出一头。

另一方面，容闳对太平天国的看法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使他不了解太平天国起义农民反对封建经济基础和整个上层建筑的行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提出了一些资本主义改革的方案，诚然是进步的，但是，如果不摧毁封建经济基础和整个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根本没有能力打垮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这就决定了容闳的改革方案是缺乏实现前提的空想。

由于容闳不了解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他错误地把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失败归咎于后期加入太平军的士兵“为社会上最无知识的人”，“为太平军之重累”^⑥。这暴露了他不

① 《西学东渐记》，第57页。

②③ 《西学东渐记》，第58页。

④⑤ 《西学东渐记》，第61页。

⑥ 《西学东渐记》，第62页。

认识劳动群众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唯心史观。正是这个世界观的根本原因,使他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失去信心。所以他虽然以当时罕见的胆识亲往天京实地考察,结果却是置身事外。

二

天京之行是容 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之一。在此之前,他抱着西方的民主思想,对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观察、比较,还未决定自己的动向;在此之后,他迅速转到维新派的路线上面去了。更由于他对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许多人物存有片面的看法,觉得他们的品格和所筹划的政策不符合他自己的资产阶级标准,并对他们的革命事业失去信心,这就必然投向太平天国的敌对方面去。处在两个阵营极端尖锐的斗争的时代,形势迫使人们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所以,当曾国藩主动罗致他的时候,他就引为知己,出而效力,这就不是偶然的遭际了。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起,正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办洋务”热潮兴起的年头,曾国藩是主持办洋务的实权派大官僚之一,他看中容 的才干和熟悉美国情况的特点,决定利用他筹建第一间规模较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局。曾国藩急于增加新式军火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容 在当时对建工厂的想法是与此不同的。他认为:“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①他还直截了当地对曾国藩说:“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②正是他这种工业建设的眼光,使得江南制造局客观上在我国工业史上占一席位。

能不能以容 卷入洋务运动而论断他属于洋务派?我们认为不能。这不但因为从容 毕生的言行来看得不出这个论断,而且就他办洋务时的思想来看,容 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路线是格格不入的。他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三纲五常这个“中学”的灵魂,但他对封建统治的专制、顽固、腐败非常反感;他更不仅仅以西学为“用”,而是要把西学作为立国的根本。他心目中的西学,就是一整套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他要对中国进行根本性的资本主义改造。

但是,回国后六七年来实际观察,使他觉得徬徨,觉得无从下手。及至他考察太平天国又抱失望离开天京,他于是开始另一种探索,那就是企图利用洋务派的政治势力,从工业建设和教育事业入手,为改造中国开辟一条具体的途径。历史事实证明,容 和洋务派人物终于无法共事,最后还以张之洞下令通缉他而断绝一切关系。

正是在共同的变法维新路线的指导下,容 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十九世纪

① 《西学东渐记》,第75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76页。

末叶掀起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1897年容闳在北京向清廷建议设立国家银行,这时他与康、梁等结交,彼此颇为投契。他也和康、梁一样对光绪皇帝寄予无穷的希望,期待这个年轻君主能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实现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他说:“光绪当亲政后,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其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①这里对光绪的称赞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在此我们不想就这题外问题进行讨论,只不过借此说明容闳认为光绪可以实现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专政。

康、梁也从容闳那里学到不少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知识。康有为后来改订并出版的《大同书》,就竟然把美国说成是理想的大同社会的范例。书中写道:“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②这本书的思想实质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美化,这是十分清楚的。

戊戌政变时,容闳因曾将其在京寓所供给维新派领袖人物作为会议的场所,被认为有“隐匿维新党人之嫌”,不得不逃出北京,先赴上海后转香港避难。当在上海时,他仍然热心变法维新的事业,慨然纠合同志,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强学会”^③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1900年,容闳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上海“张园国会”,与会者有各地维新派代表人物数百人,公推容闳为会长。他还为自立会起义起草了英文对外宣言,其大意是:“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政权必将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以伸张乐于全世界,端在树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利与之人民。”^④这证明容闳政治立场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在戊戌政变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觉悟到和平变法的路行不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满清政府决裂,赞成唐才常反清武装起义;他的侄子容星桥和自立军武汉首领林圭联络,由容星桥借俄国洋行买办的身份为掩护,参与机密。后武汉自主军还来不及起义,就被鄂督张之洞残酷镇压下去,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被捕后就义。张之洞还通电捉拿容闳,容闳被迫赴香港避难。清政府必欲捕获容闳而后快。当容闳前往台湾游历时,浙闽总督还致公文给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子爵,要求逮捕容闳引渡回国法办,因儿玉拒绝清政府的要求,他才没有被害。

1902年容闳参与了“大明顺天国”起义前的秘密活动。“大明顺天国”起义,史称“壬寅广州起义”(按壬寅年为1902年)。这次起义的组织者是兴中会员谢赞泰、李纪堂和洪门前辈洪全福等。洪全福是洪秀全的从侄,“幼随天王转战桂、湘、鄂、皖、苏、浙各省,晋封左天将瑛王三千岁。天国败,走香港,受雇于外国轮船为厨工,航行四十

① 《西学东渐记》,第122页。

② 《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10页。

③ 容闳发起和组织的“中国强学会”,时间在1898年;而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时间在1895年,二者并非同一组织机构。

④ 参见《唐才常烈士年谱》,载《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页。

年,始隐居香港,悬壶行医”^①。谢赞泰策划在广州举义,以洪全福为起义军事领袖,商定起义成功即建立称为“大明顺天国”的民主共和国。谢与容闳意气相投,“向容历陈与洪全福、李纪堂谋在广州发难之种种计划,容极首肯,允至美后尽力相助”^②,当时并决定推容闳为大明顺天国临时政府的总统。这次起义因奸细告密,事泄失败。

1902年,容闳已到了七十四岁高龄,回顾自1855年末次归国以来,投身政治活动,积极救国,与清政府势成水火,竟至于不能再在祖国立足,于是决定离香港赴美终老。不过,他赴美后绝非从此不与闻国是,其爱国热情终身充沛。当他离港前夕,有革命青年刘禹生(后为同盟会员)去拜访,容闳对他畅谈中国革命前途以及国际形势等问题,有下面的一段话:“孙逸仙自伦敦释回,访予谈数日,……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勖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再谈时局之将来,中国能勃兴,日本则退居二位,否则,日本独握东亚霸权,欧美又岂能漠视乎?日本地小不足以回旋,必向中国扩张,……东亚主人,终在中国。”^③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他的这番话是有卓识远见的。

容闳赴美养老时,写成回忆录《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于1909年底出版。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孙中山在1912年1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孙中山致书容闳,请他回国共襄国事。信中写道:“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④孙中山对容闳极为推崇,但这时容闳已卧病在床,未能成行。在容闳生命的最后十年中,积极倾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同时,他的世界观亦有很大的变化。他在评论义和团时说:“汝以为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船货,其举动何殊义和团?……中国下层愚氓,民气已动,将及于士大夫”^⑤。把义和团与美国独立战争相比,未必确当,但他的言外之意是赞许义和团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反抗,这种见识在当时可说是出类拔萃的。他虽然还不能洞悉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动本质,但他绝无洋奴思想,他在一定程度上懂得把美国统治阶级的人物和民间友好人士加以区别。

容闳就是这样在政治上能跟着时代潮流不断前进,他的思想特点是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富于务实精神。

三

容闳在写回忆录《西学东渐记》时,十分重视他负责派遣留学生的教育事业。他在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六册,第1665页。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109页。

③ 刘禹生:《纪先师容纯父先生》,第115页。

④ 《国父全集》,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编,1973年版,第三册,第229页。

⑤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第115页。

这本书的自序中写道：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①。诚然，派遣留学生是当时一件开创性的事业。它有着明确的教育目的，是一项颇具规模的智力开发事业。容闳可称为人才学的前驱。这个事业和他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首先，这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挑战。中国封建教育的目的，所谓教忠教孝，完全是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服务的。教育内容离不开四书五经的死教条，还加上适应科举需要的八股试帖之类的东西。教育方法完全是灌输教条和箝制思想。这种教育到清代末世仍居正统地位。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西方思想逐渐输入，封建教育的弊病暴露无遗。接着洋务派推行洋务教育，如开办新式学堂，聘请洋人教习等等，为他们的洋务事业培养工具。但他们在教育方针上仍然抱着“道不可变”的主张，封建性非常明显。张之洞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而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②他同时攻击维新派提倡新学为“不知本”，说什么“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③。所以，洋务教育归根到底只能是封建教育的小兄弟。它虽然在客观上起过一点点培养技术和外语人材的作用，但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容闳在洋务派支持下订定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并亲自担任留学生的监督，总的说来，容闳规划的留学生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而不是封建性的洋务教育。容闳和担任留学生事务所副监督的陈兰彬以及和继任监督吴继区的纷争，主要是由于教育思想的对立。陈、吴两人“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④，他们以封建卫道者自居，根本上反对派遣留学生。他们之所以担任留学生监督，正是为了代表顽固派从中破坏留学生的教育事业，事实上留学生计划终于被他们阻挠并导致中途而废。尽管如此，由容闳派遣和培养的留学生中也成就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材，如成为中国著名的早期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当年就是第一批派送的少年留学生。

容闳很重视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在自己留学生活中就不间断地半工半读。后来在创办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兵工学校，实行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验(实习)相结合的方针，成效卓著。

他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德育、智育、体育不可偏废的道理。他借美国教育家阿诺(Dr. Arnold)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⑤他支持留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当副监督陈兰彬极力反对学生在读书以外的一切活动时，容闳则认为，青年人“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⑥。这些观点，在我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上，都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① 《西学东渐记》，第1页。

②③ 张之洞：《劝学篇》。

④⑥ 《西学东渐记》，第103页。

⑤ 《西学东渐记》，第17页。